

《孔雀东南飞》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归异并用

高焕姣,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摘要】《孔雀东南飞》作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经典之作, 文本中包含大量体现传统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文化负载词。因此, 本篇将这首诗歌作为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归异并用的研究对象, 以李正栓、杨宪益、戴乃迭及安妮·比勒尔三个不同的英译版本作系统对比。以奈达文化分类理论为框架, 从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角度, 对诗中所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式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 译者在翻译时可灵活运用意译、直译诸种方法, 兼顾源语文化特征的保留与译文的可读性。因此, 本文既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策略的认识, 也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有意义。

【关键词】归化与异化; 《孔雀东南飞》; 文化负载词; 归异并用; 典籍英译

【基金项目】河北省 2026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典籍英译”(YKCSZ2026017)

【收稿日期】2026 年 6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7 月 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38

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ng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Peacocks Fly Southeast*

Huanjiao Gao, Zhengshuan L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Abstract】 As a classic of ancient Chinese narrative poetry, *The Peacocks Fly Southeast*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culture-loaded words that reflect traditional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concepts. Taking this po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r the combined us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ng culture-loaded word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ree English versions by Li Zhengshuan,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and Anne Birrell. Using Nida's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it conducts a case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used to translate these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nslators can flexibly adopt various approaches, such as free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to balanc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ource culture's distinctive features with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arget text. Therefore, this paper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but also bears significance fo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 Keywords 】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he Peacocks Fly Southeast*; Culture-loaded words; 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1 引言

汉语诗歌英译近年已然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但受历史条件及现实传播环境诸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整体影响尚有限,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传播效果仍有明显的不平衡之处^[1]。作为中国文化最精粹的载体之一, 古代汉语诗歌的英译恰可视为深入这种不平衡、探索有效传播路

径的典型样本——正因为肩负这样的期待, 相关研究才既面临诸多困难, 又蕴藏着突破的可能。对古代汉语诗歌英译的研究道阻且长, 然前路可期。

作为叙事诗, 《孔雀东南飞》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孤篇横绝”^[2], 且近年来学界对《孔雀东南飞》的研究视角已十分多元, 贾晓英、李正栓对此做了细致梳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相关研究已突破传统单一的

*通讯作者: 李正栓

文学阐释模式,从女性主义、宗教文化、礼俗制度、服饰文化诸种角度展开分析,且常引入社会学、美学、心理学诸种理论加以补充^[3]。然而,目前学界对《孔雀东南飞》的讨论多从文学、文化或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其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系统研究仍显薄弱,尤其是从奈达文化分类理论及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结合的分析框架出发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归异并用是有必要探讨的议题。

2 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其语言系统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包含了丰厚的文化底蕴^[4]。在翻译研究中,对这一类词语的处理,首先需要有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奈达在翻译理论中讨论了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且将文化要素划分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五个方面^[5],为系统考察文化负载词提供了重要的分类基础。而从更宏观的文化层面看,文化负载词的有效译介,直接关系到文化交流的深度。文化负载词有重要作用: Bassnett 和 Lefevere 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有某种“翻译性”,即以吸收、转化外来文化现象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6]。正因如此,汉语古诗英译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才尤为重要。刘锦晖、马士奎认为:汉语古诗英译中的文化差异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于文化负载词及文化特定意义的表达^[7];季红琴、周昕怡对此作了补充:对文化负载词翻译进行系统研究确实有利于提高中国文化元素国际传播的表达效果^[8]。就本研究而言,对《孔雀东南飞》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的考察,本质上正是探究其作为中国文化传播一种形式的有效性,这便是本文的出发点。

3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提出的“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理论为此提供了极清晰的理论框架。

归化策略是指译者在翻译时有意识、有计划地按目标语的表达方式及文化规范对原文加以调整,因此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更宜于目标语文化环境^[9];异化策略实质上是保留原作的文化差异性,即译文要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的特点,因而也必然让读者觉察文本中所涉的文化差异^[9]。这一理论区分的滥觞,可追溯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对两种翻译取向的经典界定:其一为使读者向作者靠近,其二为使作者向读者靠近^[10]。

在翻译实践中,归化与异化绝不是彼此对立的两种

方法,而是可以根据具体语境灵活、审慎地使用。二者各有优势,二者灵活运用,才能达到文化翻译的交际目的^[11]。这一点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古典充斥着大量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译者在翻译时不可避免要要在文化传递与译文可读性之间求得平衡。文军认为古典诗歌翻译从来不只是语言形式的转换,必然也涉及文化意象及文化内涵的再现,故而不同译者处理文化因素时自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12]。对此,张智中对此做了补充说明:

“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诗歌翻译更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说诗歌可译,其实是指诗歌在妥协基础之上的可译、诗歌的可译论,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13]。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就归化或异化策略所做的具体选择,必然受到翻译规范及读者接受习惯的深刻影响^[14]。因此,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译者实际上经常要在保持源语文化特征与提高译文可读性之间做权衡,而此种权衡自然而然地体现于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

4 归化策略下意译法的使用

就翻译方法而言,注重语义传达而非形式对应的意译,在翻译理论界有着深厚的基础。奈达表示,即翻译时首先要关注意义的准确传达,之后再考虑风格问题^[15]。纽马克指出:意译是文本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时所保留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6]。以汉诗英译的实践观之,许渊冲认为“如果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并不一致,那就不必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又忠实于原文形式,只要忠实开原文内容即可”^[17]。贾晓英、李正栓则进一步指出:若能充分、准确地把握文本根本意义,译者在翻译时就不必机械地受原文句法结构及表达方式的限制^[18]。概而言之,意译策略的实质在于使译文摆脱对原文形式的机械依从,以语义层面的准确性为优先追求。《孔雀东南飞》三种英译本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正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翻译理念。

《孔雀东南飞》三种译本作者,即李正栓(以下简称“李译”)、杨宪益与戴乃迭(以下简称“杨戴译”)、安妮·比勒尔(Anne Birrell,以下简称“比勒尔译”),三位译者均有采用意译法,对原文的文化信息予以转化或解释性再现。这一共性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观察视角。本节拟以物质、社会、语言、宗教、生态五类文化负载词的具体译例为基础,系统、有层次地考察三位译者在归化策略下如何做到文化传递与读者接受两者的平衡。

表 1 归化策略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	李译	杨戴译	比勒尔译
箜篌	lyrical string	lute	many-stringed lute
绣腰襦	broidered short jacket	broidered jacket of brocade	embroidered tunics
社会文化负载词			
新妇	Lanzhi	She	His new wife
女儿	a girl before marriage	-	a child
语言文化负载词			
媒人	go-between	-	matchmaker
冥冥	the sun's setting	draws unto its close	goes to darkness
宗教文化负载词			
良吉	The best date	a heaven-favoured day	The luckiest day
黄泉	Dead	naught but death it self sever us	our souls
生态文化负载词			
青雀	black magpie	lucky birds	A green sparrow
南山石	a long life	rocks of Nanshan Range	South Mountain's rock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箜篌”的解释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的弦乐器,有多弦特点^[19]。三位译者均未选择直接保留这一文化专有名词,而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意译来完成转换。李译为 *lyrical string*,即先点明“弦乐器”,*lyrical* 指出其抒情的音乐特点,更偏向从功能或音乐特征的角度进行概括性的说明;杨戴意译为 *lute*。在西方音乐传统中,*lute*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拨弦乐器,用一个功能和演奏方式都比较接近的对象来替代原来的器物,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削弱“箜篌”本身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读者很可能会把它直接理解成西方的鲁特琴;比勒尔意译为 *many-stringed lute*,修饰语 *many-stringed* 提示了该乐器有“多弦”的特点。因此读者在理解时既可以用熟悉的乐器概念作为起点,又很容易联想到它与普通 *lute* 不同之处。与前两种译法相比,此种译法在归化表达的基础上保留了原器物典型的形制特征。

“绣腰襦”指的是一种腰部略微收紧且带有刺绣装饰的短袄。三者翻译均未直接保留文化专有名词,而是以各种形式对之做了英语语境下更易于理解的服饰概念的转写。李意译为 *broidered short jacket*,其中 *broidered* 对应刺绣装饰,“short”说明衣物长度较短的形态,译出刺绣装饰的同时又保留了衣物“短”的形态特点;杨戴意译为 *broidered jacket of brocade*,其中所用的 *brocade* 一词突出了衣料为织锦材质,因而所译服饰更有富华贵之感,与李译相比,此种译法更突出材质信息,但对“腰襦”本身的结构形制则着墨较少;比勒尔意译为 *embroidered tunics* 用目标语文化中已有的服

装概念做了恰当的语义转换。在西方文化语境里,*tunic* 通常指古希腊或古罗马时期较常见的一种宽松且长衣式服装,这和汉代女性所穿的短腰襦其实还是存在一定差异。

“新妇”由已婚女子用来指代自己,表明女性已婚的社会身份又带有自谦和礼貌意味。三位译者均采用了偏向归化的意译方式。李译更重视叙事表达的清楚性,故直接用人物姓名指代。但“新妇”所包含的婚姻身份意识以及自谦语气,在译文中基本没有表现出来;杨戴用第三人称代词 *she* 来指代人物,让句子结构更简洁,读起来比较顺畅自然,但 *she* 只是一个代词,“新妇”这一称谓原本所包含的婚姻身份信息在译文里几乎完全省略了,读者很难从 *she* 中意识到人物的社会角色,所以原句所带有的文化意味不易被感知;比勒尔译作 *his new wife*,而诗歌情节此时刘兰芝已经被遣回娘家,故此该译法从语义上说确有偏差。

“女儿”这个词不仅表示父母的女性子女,还常常用来专门指尚未出嫁的少女。三位译者均未直接使用 *daughter* 这一字面对应词,而是根据各自理解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意译处理。李译为 *a girl before marriage*,对“婚前身份”的信息作了保留;杨戴对原句做了语义调整,用 *I am of humble origin* 做了巧妙的语义重组,把人物自谦语气的表达放在突出位置。与李的译法相比,此种处理再现了话语的交际功能,因此表达的重点从“未嫁身份”转移到了“自谦陈述”之层面;比勒尔译 *a child*,用 *child* 来概括人物成长的阶段,但此种概括必然带来一定的信息损失:*child* 没有保留原文中所涉

词语的性别特征,也没有保留“未婚少女”的婚姻身份意义,故而原句中所隐含的社会角色在译文中就显得相对模糊。

“媒人”通常指的是在两家之间牵线搭桥、替双方传递信息,并最终促成婚姻关系的人。三位译者在处理“媒人”这一社会文化负载词时,都没有选择直接保留原有称谓,而是通过不同方式进行意译转换,只是在表达重点上各有侧重:李更强调其中介沟通这一功能,因此用 *go-between* 来概括角色作用,语义范围覆盖了婚姻中的撮合者;杨戴在译文中则没有直接呈现“媒人”这一角色,而是通过叙事描写把相关情节表达出来。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下,“媒人”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实际上淡化了,原本应该由媒人承担的信息传递任务,转化成叙事事件的一部分;比勒尔译为 *matchmaker*,与 *go-between* 相比,*matchmaker* 英语词义中对“撮合婚姻的人”有更明确的指称。

“冥冥”借助“昏暗”的意象来暗示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三位译者处理“冥冥”语言文化负载词时都采用了归化式意译策略,但各译法的着眼点及具体方式又各不相同:李以“日落”自然意象建立文化上的类比关系,象征生命的终结或者事物的衰落,也让英语读者能联想到生命走向终点这一含义的,保留了原隐喻;杨戴译为 *life draws unto its close*,径直表达了生命即将结束的意思,让读者能立刻抓住句子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但没有保留原文中所用的自然意象,原句中的文学气氛也弱化了;比勒尔译为 *goes to darkness*, *darkness* 既有客观的黑暗环境的含义,又可用作死亡或生命终结的象征性比喻,又顺势引出死亡的含义,与前两种译法相比,没有全然舍弃意象,也没有过分隐晦。因此可以说,这是象征意味与语义二者都兼顾得的表达方式。

“黄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指代阴间或地下世界,被视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道界限,有较为明显的宗教文化意味。在文中,“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是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所立下的誓言,在语义上同时包含了婚姻誓言与生死承诺的双重意味。李译未保留原文中的“黄泉”文化意象,而是用表示生命状态的 *Dead* 予以替代,因此原句中所要表达的“死后仍然相伴”的基本意义得以保留,只是“地下世界”这一有明确空间感的传统意象在译文中被省略;杨戴译法没有保留“死后相伴”的具体意象,而是转化为誓言式的表达: *naught but death itself shall sever us*, 此句式在英语文化中本身就是典型婚姻誓词,故用来强调夫妻彼此坚不可摧的关系;相比之下,比勒尔保留原文所涉的文

化意象,用音译式的直译方式译出“黄泉”,故其译法有异化取向,也因而再现了原诗的文化内容,但 *Yellow Springs* 在英语文化中不是广为人知的宗教或神话概念,故而此种译法客观上确实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

“良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用来指代吉利、宜于办事的日子。三位译者翻译“良吉”民俗文化词时都从“吉利日子”的意义出发进行语义转写:李侧重于时间的合适性,译为 *the best date*。英语中的 *date* 本身就可以表示某一天或某个约定的时间,因此 *the best date* 这种说法能够比较直接地表达“最合适的日子”。这种译法在语言上简单明了,而中国传统择吉文化在译文中就没有太明显地体现出来;杨戴保留了少许“天意”的文化意味,和简单的 *good day* 相比,这种表达更带一点文化意味,也暗示这个日子之所以吉利,是因为它被“天”所庇佑。这样一来,译文在表达吉祥含义的同时,也多少把传统择日观念背后的思想背景带了出来;比勒尔译为 *the luckiest day*,而英语中 *lucky* 一词本来就有表示好运、吉利的自然用法,故 *the luckiest day* 表达了“最吉利的日子”之义。与 *the best date* 相比,*luckiest* 一词突出了好运、吉祥的意味,因此读者很容易明白这是被当作最有好运的一天来谈论的。

“青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般被当作吉祥之鸟来对待,常与祥瑞、高贵诸种意象连用。三位译者不同的处理思路:李用 *black magpie* 予以具体鸟类名称的翻译,因此译文有画面感,虽然从物种、颜色两方面看,“*magpie*”与“青雀”并不严格对应,但是译文保留了“鸟类装饰”的基本意象,故而读者阅读时会产生相应的视觉联想;杨戴用 *lucky birds* 做概括性翻译,因此与前一译法不同的是,其没有就具体鸟类种类加以表述,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明“青雀”在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义,即吉祥的鸟类,故而译文既很好地保留了原句的吉祥寓意,又避免了因具体鸟类名称翻译不当而引起的文化误解;比勒尔的译文从形式上说,其“*green*”与“青”相对应,“*sparrow*”与“雀”相对应,属直译。但在英语文化中,“*sparrow*”一般被当作一种常见的小鸟来看待,没有原著中所涉吉祥、高贵的文化内涵,因此该译法在文化寓意的传递上与原文仍有可察觉的差别。

“南山石”主要寓意是长寿与身体安康。三种译法在翻译取向上的不同特点:李译法最归化,故舍去具体文化意象直接译出祝福含义,而是转写祝福的实质内容“长寿”和“身体健康”,译文简洁明快;杨戴翻译此句时采用了改写手法,虽然译文仍保留 *Nanshan Range* 地名,但译文所承载的语义已经偏离原句中对母

亲作祝福的语境；比勒尔的译法对归化与异化两种方法作了折中处理：既保留了 *South Mountain's rock* 的意象，又用英语中十分常见的祝愿句式 *May your life be like...* 来翻译，因此即便读者对终南山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一无所知，也完全可以从译文中了解“像山石一样坚固长久”的含义。

5 异化策略下直译法的使用

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我国译者应尽量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20]，异化策略便是一条重要路径。“异化翻译策略在吸收英语诗歌要素的同时，又满足了诗歌读者对诗歌形式与内容方面的期待。就汉诗英译而言，在

诗歌形式上，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更能反映中国古代诗的状态，更有助于将中国古代诗歌的诗体移植到英语世界里去”^[17]。李正栓、高田亦强调：异化策略有利于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也有利于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21]。直译是实现异化效果的重要方法之一。杨自俭、刘学云认为直译是“在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的情况下译文刻意求真，通过保留原作形貌（表达方式）来保持原作的内容与风格”^[22]。因此，采用直译法能让译文内容读起来简明扼要、流畅自然，再现了原诗中的异域风情，从而实现典籍翻译还原中国文化本来面目的最终目标。

表2 异化策略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	李译	杨戴译	比勒尔译
床	stool	stool	bed
香囊	perfumed bags	perfumed herbs	scent sachets
社会文化负载词			
秦罗敷	Qin Luofu	Qin Luofu	Ch'in Lofu
县令	county magistrate	county magistrate	district magistrate
语言文化负载词			
旦夕	from morning to night	Soon will I send a go-between to her	dawn to dusk
宗教文化负载词			
天地	Heaven and Hell	A greater contrast would be hard to find	Heaven and Earth
鬼神	ghost or deity	No ghost, no devil	Yellow Springs
生态文化负载词			
青骢马	horse with black and white hair	well-groomed horses of the finest	piebald horses
清池	pool of clean water	The pond's dark waters	the clear lake

《现代汉语词典》对“床”的基本解释是“供人睡觉或休息的家具”^[19]，但在古代文学语境中，这一词语往往更接近“坐榻”或“矮榻”的概念。三位译者翻译“床”一词时有不同取向：李及杨戴均采用归化策略，以 *stool* 替代“床”，一般指无靠背的矮凳，是英语世界中常见的坐具，故可知两位译者把“床”明确地理解为可供坐用的家具，而非睡眠用的床具。用西方读者熟悉的家具名称来传达其基本功能。但此种替换也必然导致古代“床”兼有坐卧之用的文化特点在译文中的损失；而比勒尔采用更接近字面的译法，用 *bed* 保留原词基本意义，但语义有偏差。*bed* 在形式上保留了原词的基本含义，但是英语读者读到时一般会理解为“人物在睡床上发怒”，与此时中国古籍中所载之“床”兼具坐具功能的实际使用情况有明确区别。

“香囊”以丝绸缝制小袋，内装香料或草药，故有散发香气之用，常被赋予祈福吉祥的象征意义。李译为

perfumed bags，重在保证译文简洁易懂。其中 *bag* 用来指装物品的小袋，而 *perfumed* 说明了袋中有香气，英语读者见之即知，乃是一种装有香料的小袋子，但由于 *bag* 的语义比较一般化，故“香囊”原有的精致感及文化意味在译文中有一定弱化；杨戴译为 *perfumed herbs sewn in its corners four*，从所装之物及其用途两方面予以说明，即“缝在四角的香草”。但此种译法也客观上弱化了“香囊”作为具体器物的形态特征，翻译的重点移至香料本身；相比之下，比勒尔直译为 *scent sachets*，与原物最为贴合，在文化再现上最准确。英语中的 *sachet* 指装有香料的小袋，常用来放在衣柜内或室内散发香气，故其用途及外形都与中国传统的“香囊”十分相近。与一般的 *bag* 不同，*sachet* 的语义更具体，也带有几分精致、雅致的意味，因而能极好地再现原词的物质属性。

“秦罗敷”用作形容女子美貌、贤淑故此该名字绝

不止是人物称谓,更是一种文化意象的载体。三位译者都保留了“秦罗敷”的音译形式 Qin Luofu 或 Ch'in Lofu, 因此可以归结为典型的直译(音译)策略:即用拼音或音译直接再现原名,由此让译文尽可能保留中国文化中所涉专有名词的特征。也正因译者没有对人物名称作意义解释或改写,故读者直接见到的是原文化中的人物名称,因而译文有十分明确的异化取向。三者若用意译方法处理“罗敷”,译者本可再现其所象征的美貌之义,但是也必然要改变原有人名的形式,可能弱化其作为文化专有名词的独立性。故而音译保留原名既是文本文化真实性的体现。

“县令”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中基层官职,即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李、杨戴均译作 county magistrate, 其中所用的 county 一词突出了行政区划层级,因而与中国古代“县”的概念十分贴近,故而从语义上说是原词行政范围的再现。同时此种译法既保留了中国官制的层次特征,又使用英语读者易于理解的政治术语;比勒尔译为 district magistrate, 而英语中 district 虽也表示行政区域,但是其范围比中国古代“县”要宽广得多,故严格说来不宜直接等同于“县”,因此在行政层级的精确性上确实比 county 差一点。但是,此种译法可清楚说明人物作为地方长官的身份,不会造成实质性误解。

“旦夕”是中国古代汉语中常见的时间词语,其中“旦”指清晨,“夕”指傍晚,两字组合通常表示极短的时间,也可表示“朝夕之间”。李直译为“from morning to night”,表达其基本时间范围,语与“旦夕”的基本含义相符。相比“dawn to dusk”,“morning to night”更偏向日常表达,语义层面准确,但在意象层面略显不足,因此文化特色稍弱;杨戴则未直接再现“旦夕”这一时间意象,而是通过“Soon will I send a go-between to her”表达“很快就会采取行动”。这种处理方式属于意义转化,将原文强调“时间短暂”的含义转化为“很快发生”的语义,因此虽然保留了时间紧迫的感觉,但舍弃了“旦夕”这一具有对举结构的时间表达,使原有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未能体现出来;比勒尔用“dawn”与“dusk”分别对应“旦”和“夕”,基本按照原词结构进行对译,较好地再现了原句的时间意象,读者能够直观地理解“从清晨到傍晚”的时间范围。

“天地”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往往成对出现,常用来表达事物之间巨大的差异或悬殊的对比。李用 Heaven and Hell 的文化替换来作归化处理,故对比关系甚为明显,在英语文化中,“Heaven—Hell”的对立一

般用来象征善与恶、幸福与痛苦诸种极端状态,故而读者能体会原文中所要表现的巨大反差;杨戴用释义方式直接译出“差异极大”的含义,因而译文直接表达了原句所要突出的意思:两者的差别之大。但原句中“天地”所作的形象化比喻在译文中被删去,因此原文中所蕴含的自然意象消失了,译文在文学性、审美感上确有相应的弱化;比勒尔译为 Heaven and Earth, 形式上保留了原句的意象结构,故而与原句表达贴近。译者保留了“天地”的文化意象,让读者直接体会原诗的表达方式。但“Heaven and Earth”并不直接承载“差距极大”的比喻意义,因此读者要充分结合上下文方能体会其隐含之义。

“鬼神”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的重要概念。“鬼”通常指死者的灵魂或阴间之灵,“神”则指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或神祇。李译为 ghost or deity 体现了异化式直译,其中“ghost”对应“鬼”,“deity”对应“神”,这种译法保留了原词的双重结构,再现了原有的宗教意象;杨戴译为 No ghost, no devil. 其中“ghost”仍然对应“鬼”,但“devil”在西方文化中通常指恶魔或魔鬼,这一译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词的文化含义,使“鬼神”从“鬼与神”转化为“鬼与魔鬼”,带有一定的文化替换性质;比勒尔则未直接译出“鬼神”,省略了这一意象,更侧重人物情感与心理状态。

“青骢马”指的是品质优良、十分名贵的马,常用来象征身份地位。李译则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译法,“the horse with black and white hair”这样的表达方式,通过解释性的描述直接把马匹毛色的特征说明出来。不过和 piebald 这种专门词汇相比,这种描述方式稍微显得有些冗长,在文学表达的简洁性和形象性方面就略微弱了一点;杨戴直译作 horses of the finest breed, 没有保留“青骢”所指的毛色信息,而是把译笔转到马匹的品质上,以 finest breed 说明马之优良、名贵,因而马匹的华贵气派在译文中表现出来。但原诗中具体可感、富于意象色彩的颜色描写被省去,故读者读此译文时便不容易直接唤起对“青骢马”原形的视觉联想;比勒尔译成 piebald horses, 相比之下更简洁。英语里的 piebald 一般用来形容毛色黑白或深浅相间的马,与“青骢马”这种杂色马在外观上比较接近,能够比较好地再现原词的外貌特征。

“清池”,“池”即池塘或水池,“清”为水质澄明之状,其本身就有营造意境之用:清澈静穆的水面流露出宁静乃至冷寂之感,故宜与人物的悲剧命运形成情理上的对照。李译严格再现原词结构,译为

pool of clean water, pool 与“池”相对应, clean water 用来表现“清”的意思, 因此原词字面意义准确地保留下来, 读者可理解为一处水质清澈的水池。虽然用语直白, 但是从语义上说, 对原词的基本形象有恰当再现; 杨戴用 the pond's dark waters 予以翻译, 把“清池”译为“幽暗的水域”, 又以 dark 诸词渲染了水之阴冷、幽暗之感, 故人物投水时的场景显得沉重、悲凉。但原词中所含的“清”的视觉意象已经发生变化, 澄明的水面变成了阴暗的水域; 比勒尔将“清池”直译作 clear lake, 其中 clear 与“清”相对应, 再现了水面澄澈透明的感觉, 又因为 lake 在英语中比“池”稍大, 故此种译法既准确, 也很自然地唤起读者对清澈水面的画面感。

6 结语

综上, 三位译者在翻译《孔雀东南飞》时并没有机械地贯彻单一的归化或异化策略, 而是从词语的文化特征、所在语境、目标读者的理解习惯诸种因素出发, 灵活、审慎地在直译与意译之间作出调整; 具体而言, 凡文化意象十分突出的词语, 译者大都予以直译, 而凡原文中某些概念在目标语文化中极难理解, 译者便主动做意义转换以保证译文的可读性。

本文以三种《孔雀东南飞》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从归异并用的角度对诗中有代表性的文化负载词翻译作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 译者处理不同类型的文化负载词时没有机械采用某一种翻译策略, 而是因地制宜, 在文化传递与译文可读性之间求取平衡。

三位译者的翻译实践各自印证了这一结论, 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与侧重。李正栓明确主张“异化为主, 归化为辅”的翻译方法^[23]; 杨宪益翻译作品时“不仅追求作品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还努力做到‘信、达、雅’, 充分展示中国文学的神奇魅力”^[24]; 其妻戴乃迭谈及翻译中处理文化难题时坦言: “我们用各种办法来解决, 一是在文中加上一些原文没有的词, 二是加脚注, 再不就不用这个具体的典故, 尽力创造出适合这种场合的气氛来”; 比勒尔翻译典籍作品时采用了厚重翻译的技巧, 这种技巧通过大量加注为读者提供更为广泛的语言和文化语境^[25]。这些不同的策略选择, 正是译者在文化传递与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具体写照。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目前的研究都是以三种译本为对象, 故样本范围有其天然限制, 因此今后宜用多译本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不同译者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加以系统考察。

参考文献

- [1] 魏家海. 汉诗英译的比较诗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 孙立尧. 《孔雀东南飞》与古典叙事诗的潜流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3 (02): 89-105+194.
- [3] 贾晓英, 李正栓. 国内译者古诗英译中的归化倾向与韵体选择——以《孔雀东南飞》英译为例 [J]. 外国语文, 2016, 32 (02): 137-141.
- [4] 管邦迪, 向明友. 翻译过程的概念整合新解——以《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为例 [J]. 外语教学, 2024, 45 (01): 95-100.
- [5]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 E.J. Brill, 1964.
- [6] Bassnett S, Lefevere A,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1990.
- [7] 刘锦晖, 马士奎. 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中的概括翻译法描写研究 [J]. 外国语文, 2019, 35 (01): 100-110.
- [8] 季红琴, 周昕怡. 回顾与总结:《孙子兵法》百年英译与研究[J]. 上海翻译, 2023, (04): 79-84.
- [9]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0] Schleiermacher, F.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A]. In Robinson, D. (E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11] 孙雅晶. 京味文化口语英译的归化异化策略——以英若诚的译本 Teahouse 为例 [J]. 中国科技翻译, 2020, 33 (02): 59-61.
- [12] 文军. 汉语古诗英译的描写模式研究——以杜甫诗歌英译的个案为例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 36 (05): 72-81.
- [13] 张智中. 汉诗英译美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4]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15] Nida, Eugene and C.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1969.
- [16] Newmark, Peter. *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J]. *Babel*, 1973(19):3-19.
- [17] 许渊冲. 翻译艺术通论 [M]. 南京: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24.

- [18] 贾晓英,李正栓. 乐府英译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0, 31 (04): 91-95.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第7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0] 潘文国. 典籍翻译的下一步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46 (04): 3-15+42.
- [21] 李正栓, 高田. 汪榕培等人英译曹操《短歌行》译者行为比较研究[J]. 大连大学学报, 2025, 46(01): 51-60.
- [22] 杨自俭, 刘学云. 翻译新论[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 [23] 李正栓,田雅. 《陌上桑》知识翻译探赜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0 (06): 26-33.
- [24] 付智茜.翻译家精神研究:以杨宪益、戴乃迭为例 [J]. 上海翻译, 2014, (03): 45-47+85.
- [25] 郜菊,杨柳. 比勒尔翻译思想研究——以《山海经》英译为例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6, (03): 72-77.
-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